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建筑/(意)曼弗雷多·塔夫里(Tafuri,M.), (意)弗朗切斯科·达尔科(Dal Co,F.)著;刘先觉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世界建筑史丛书)

ISBN 7-112-03745-X

I. 现… II. ①曼… ②弗… ③刘… III. ①建筑史—世界—现代 ②建筑物—简介—世界—现代 IV. TU-09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1112 号

© Copyright 1976 by Electa Editrice, Milano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by Electa Editrice, Milan.

本书经意大利 Electa Editrice 出版公司正式授权本社在中国出版发行中文版

Modern Architecture, History of World Architecture/Manfredo Tafuri,
Francesco Dal Co

责任编辑 董苏华 张惠珍

世界建筑史丛书

现代建筑

曼弗雷多·塔夫里 著

[意] 弗朗切斯科·达尔科 著

刘先觉 等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2 印张: 35

2000 年 6 月第一版 200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107.00 元

ISBN 7-112-03745-X

TU·2889(903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世界建筑史丛书

现代建筑

[意] 曼弗雷多·塔夫里
 弗朗切斯科·达尔科 著
 刘先觉 等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本书描述了近百年来建筑与城市设计领域内的沧桑变化。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建筑领域内所发生的变化如此之快和如此复杂是史无前例的。从单体建筑到整个城市的规划设计理论；建筑大师们所倡导的国际式景观；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建筑；社会工程建设；城市化；以及由新艺术、立体派、风格派和未来派所影响的建筑等等，所有这些变化、试验与融合都是在这卷丰富的著作中所要讨论的内容。作者基本上以编年史为纲，深入分析了欧美现代建筑景观形成的社会动力，客观地对现代建筑作了阐述与分析，并尽可能避免过于简单化和先入为主。本书从19世纪欧洲和北美的城市规划开始，继而分析了美国摩天楼兴起的历史，直到20世纪70年代高技派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作为本书的结束。

本书前十三章通过探讨德意志制造联盟等组织，以及勒·柯布西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等人的作品，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发展变化，并论述了意大利、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大战期间的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建筑。第十四—二十一章回溯了第二次大战之后到70年代之间城市和建筑理论发展的轨迹，并分析了密斯·凡德罗、阿尔瓦·阿尔托等人以及声誉日隆的年轻一代建筑师的作品。

全书共有700多幅插图，包括大量实例的平面、地图、设计图、照片等等。本书二位作者曼弗雷多·塔夫里和弗朗切斯科·达尔科都是威尼斯大学建筑研究所的教师，曾在当代建筑研究方面有丰富的论著。

目 录

作者的话	4
序言	5
第一章 19世纪美国城市化的出现	12
第二章 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 I	20
第三章 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 II	32
第四章 美国的建筑与城市(1870—1910年)	50
第五章 北方的浪漫主义与加泰罗尼亚的现代主义建筑	73
第六章 德意志制造联盟: 建筑面向大都市	80
第七章 现代古典主义: 非先锋派的建筑	90
第八章 从立体主义到包豪斯前的先锋派与建筑(1906—1923年)	106
第九章 大师们的作用	119
第十章 欧洲现代运动的辩证关系: 表现派与严谨派的对立	145
第十一章 欧洲在两次大战间的城市改革尝试	156
第十二章 苏俄的先锋派, 都市化和城市规划	177
第十三章 美国的城市与建筑: 进步的年代与新政(1910—1940年)	192
第十四章 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建筑	217
第十五章 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建筑	255
第十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城市管理和建筑政策	277
第十七章 二战后大师们的创作活动	304
第十八章 介于民族化和大众化之间: 海湾地区的风格, 斯堪的纳维亚新经验主义,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阿尔瓦·阿尔托的建筑	329
第十九章 50年代与60年代的国际纵览	336
第二十章 乌托邦的国际概念	355
第二十一章 70年代的实践	362
注释	393
参考文献	401
中外文译名对照	405
照片来源	418
译后记	419

作者的话

本书是我们从 1971 年开始合作调查与讨论的成果。

对于所有各章的构想、写作与评论我们都取得了一致意见，然后作了一些分工。曼弗雷多·塔夫里负责第二,五,六,八,十,十一,十二,十七,十八,十九和二十章的原始写作；而弗朗切斯科·达尔科则负责第一,三,四,七,九,十三,十四,十五和十六章的写作。序言和最后一章是合作完成的。

我们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许多朋友的帮助和建议，现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若不是充分地利用了近些年来由威尼斯大学建筑研究所建筑历史研究室所收集的许多研究材料，我们的写作将会困难重重。在此特别要感谢研究所的全体职工总是和我们进行有效和友好的合作。

塔夫里和达尔科

序 言

现代建筑史就像是门神的两副面孔。其一面是记录着自人文主义时代以来所形成的建筑专业特点正在不断地丧失,而且到 18 与 19 世纪期间已面临危机。另一面,尽管由于新社会文化基础的发展,思想日益活跃,对于人类的环境问题十分关心,但却仍有一些保守势力要恢复它失去的地位。理论与现实往往总有一段距离:当我们认为集体因素与技术因素在新建筑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时,我们就会对现代运动充满信心,但却又不知所措,因此,我们必须要探讨现代运动的根源和它的作用。资本主义初期所解放出来的社会经济,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变革,进步思想促使了物质产品走向新技术的领域,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就是各方面的“具体劳动”已逐渐变成了“抽象劳动”。然而,这种变革并不会自动产生,我们也不能机械地等待。

由于传统的社会劳动分配方式改变了,我们对建筑学的认识也有所改变。在改革与重新分配的原则指导下,为了在旧传统的观念与新任务之间的桥梁上保持着危险的平衡,建筑学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采取着相应的对策。过去的问题是:建筑语言怎样才能成为共同关心的问题?建筑语言怎样用科学辩证的思想去解释自身的寓意与象征?建筑的双重性怎样才能隐喻它的新秩序和新目的?新的问题是:在建筑语言和超语言学的领域之间应建立怎样的合理关系?建筑语言怎样才能变为一种经济价值的手段?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才适应实际生产结构的需要?

在当代建筑领域中,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经常是在旧内容外披上革命的外衣。要取得有真正价值的答案,就得要将哥白尼式的革命引入建筑专业领域,让人们想到路斯、密斯、勒·柯布西耶,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建筑语言,而不是一种革命的伪装。

当代建筑史的内容无疑是复杂而多样的,它往往包括人类环境的结构史,也许与建筑学无关;包括计划和管理那些结构的历史;包括建筑师为掌握这些结构出谋划策的历史;也是一部新语言的历史,它打破了旧的传统,而是在为新的贡献而奋斗。

显然,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永远不可能取得统一观点。从本质上说,历史的范畴是辩证的。正是由于它有这种辩证关系,我们曾试图去克服各种矛盾,尤其是在今天,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是建筑学本身应该可以解决的。光靠讨论这些问题仍无济于事,相反,我们应该追溯整个现代建筑的发展过程,密切注视那些历史转折的关键问题,不论它具有必然性或偶然性,都在现实中起着重要作用。

要解释历史的根本关系,就要考虑各种因素的变化,包括客观的

因素和主观的因素都应进行系统地分析,就像了解一张网是如何编织起来那样。现在建筑学面临的重要问题是重建它的思想内涵,因为过去建筑物的意义已趋向减弱,而新建筑的涵义正在由生产领域和城市管理等部门起着决定性影响。政治性的因素对新建筑的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有时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同时,也应该看到思想意识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这些联系是多方面的,有怀旧的倒退思想,也有乌托邦的观点,我们应该要区别对待。

然而,也应该看到那些倒退思想与乌托邦观点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厌恶新城市而希望未来要保持原来城市的面貌,这完全是一种幻想。当我们在思想上还未弄清是非的时候,往往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要着重了解的是有哪些重要事件与历史有关。因此,本书不采用通常的历史体系,这里所讲的现代运动和理性主义之类的术语,在本书的内容里也隐藏着一些观点与其他史书不同,甚至相反。

在本书里,我们是以 19 世纪的社会危机作为研究基础的。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要追溯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影响现代建筑的各种因素。这就促使我们要在研究的方法论上具有适当的灵活性,因为各种历史事件都有许多不同的起因。

不管怎样,建筑的形式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如果不讲形式,那只能是空谈。新艺术运动在欧洲的出现,许多方面都表现的是上层中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它标志着这个阶层企图用一种共同语言来适应各个阶层的需要。维克多·霍塔(Victor Horta)和保罗·汉卡(Paul Hankar)在布鲁塞尔的一些杰作,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在格拉斯哥所作的活泼作品,瓦格纳和霍夫曼(Otto Wagner and Josef Hoffmann)在维也纳所做的一些精品,奥尔布里奇(Joseph Maria Olbrich)在达姆施塔特的艺术家园地中所做出的诗意图般的建筑,克利姆特(Gustav Klimt)的那种惟妙惟肖的象征主义,以及亨利·凡·德·费尔德和吉马德(Henri Van de Velde and Hector Guimard)在 1890 年到 1914 年之间的活动,都可以认为是最有想像力的火焰,它点燃了造型的希望之光,成为表达真理的工具。当时霍塔为塔塞尔家庭、埃特维尔家庭、哈莱特家庭所建的一些住宅,都是能和奥尔布里奇从 1900 年开始为黑森大公恩斯特·路德维希在达姆施塔特所建的一些建筑相媲美的,当时这里号称为新雅典;同时,它也能和费尔德设计的建筑、家具、器皿造型上的“力线”相似。

新艺术运动的历史在这里并不十分重要,尽管我们要认识它的代

图1 维克托·霍塔:布鲁塞尔,普帕尔大厦,1895—1899年(已毁)

图2 维克托·霍塔:布鲁塞尔,普帕尔大厦室内,1895—1899年
(已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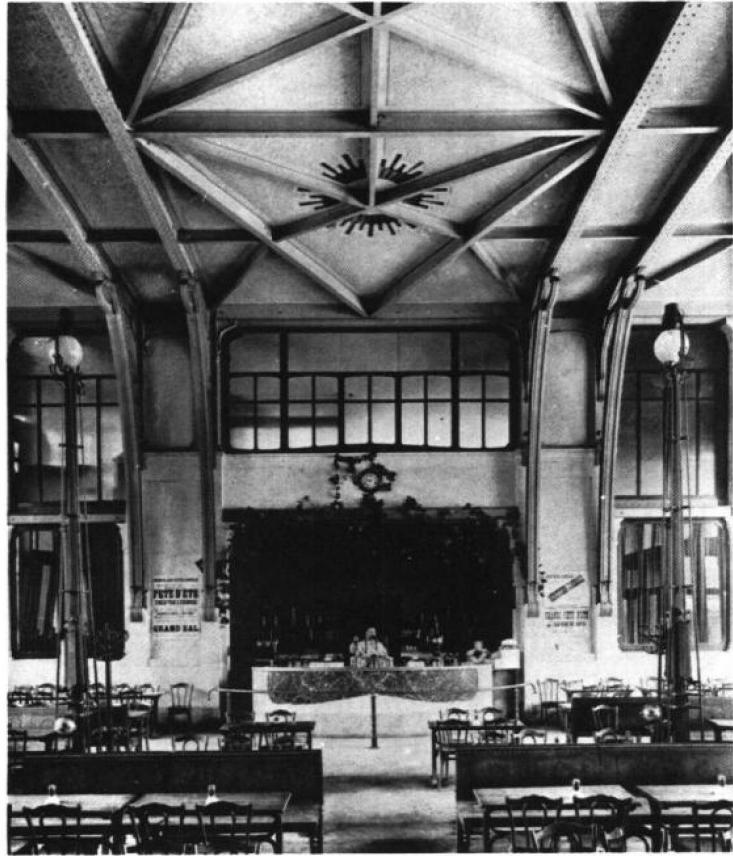


图3 维克托·霍塔:布鲁塞尔,凡·埃特维尔德住宅入口,1895—1897年

图4 古斯塔夫·克利姆特:《狂欢图》
细部,1905—1909年(维也纳,
奥地利博物馆为先锋派举办的
艺术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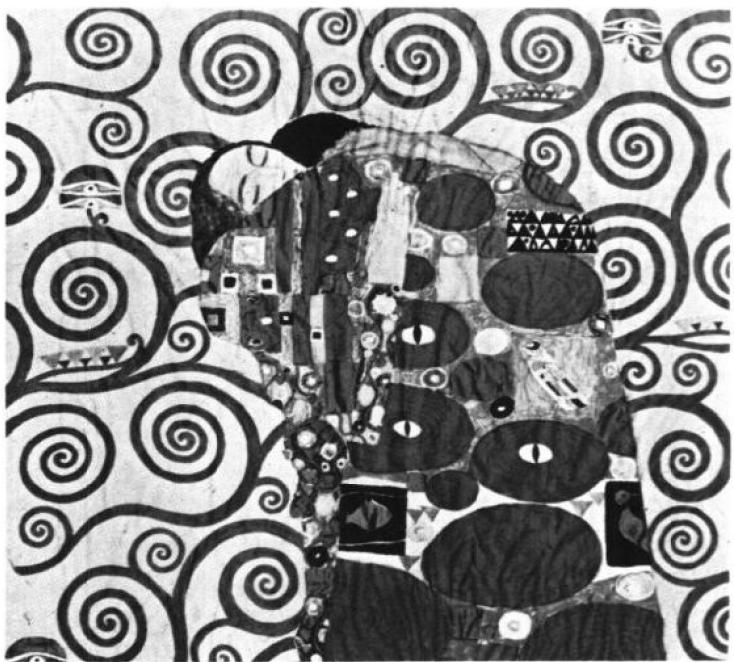


图 5 奥托·瓦格纳：维也纳，河上交通管理站办公楼，1913 年

图 6 奥托·瓦格纳：维也纳，邮政储蓄楼大厅，1903—1906 年

表人物的作品有些什么个性特点。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对新艺术运动的辩证分析，并不是说明这是恢复形式的结果，而只能说明是“室内时代”走向衰落。不是说应用各种新技术或新的社会进步因素就可以促使作品的成功，例如吉马德所作的巴黎地铁的入口，瓦格纳所作的维也纳各个地铁车站，或霍塔在布鲁塞尔所造的普帕尔大厦等。我们的目的是要弄清在这些案例中，它们的形式是如何与材料以及使用功能相协调的，从而可以透过它能认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新艺术运动是使用技术的注解，但绝不是其危机的反映。

总之，就霍塔和奥尔布里奇而言，即使他们所用自由曲线的词汇都表明只是说着一种同样的语言，但人们仍会发现这种语言的变化与活力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受新艺术运动影响的各种事物（建筑、物品、广告、墙纸图案），都表现出有自然主义的倾向，这反映在造型上大量应用曲线符号。在折衷主义没落之后，新艺术运动的语言作为一种手段，它具有完整的结构，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它希望能起到主导作用。然而这些经验都是和个人分不开的，有时它会使人迷惑。但是它的局限性则是对各种对象都是采用统一的语言表达。当霍塔或费尔德在和他们的业主讨论室内设计时，他们总是要求业主按他们的思想进行设计。为了要扩大社会影响，霍塔曾把在布鲁塞尔的普帕尔大厦的外墙设计成曲线形，以适应城市位置的特点，因而形成一座具有大众化民主政治的纪念碑。然而，对霍塔来说，他认为“人民”是无法区分不同的“精神社会”的，只有艺术家们是伟大真理的布道者，他们聚集在达姆施塔特的黑森大公的周围，用艺术来重新启发人性。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新艺术运动在城市各个角落所设计的一些建筑，就像是播下了种子，它使理想得到萌芽，但却好景不长。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曾指责维也纳是“刻有标记的城市”，他认为这是缺乏对现代社会状况的正确理解。

其次，也可以认为新艺术运动是一场消极的变革。对费尔德和吉马德，或在意大利的巴塞尔（Ernesto Basile）、松马鲁加（Giuseppe Sommaruga）、达隆科（Raimondo d'Aronco）来说，他们设计的物品和大型建筑都是从现实出发，体现了生活的需要，建筑形式都是根据活动行为进行考虑的。费尔德在解释 1895 年设计的百乐门威尔夫住宅时，他说：“为了恰当组织这座住宅的居住生活，我们了解了有关的各个环节，这也许就是建筑师的最大乐趣。”同样，这也是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的基本目标，例如霍塔、麦金托什、恩代尔（August Endell）、马佳



图 7 约瑟夫·玛利亚·奥尔布里奇：
德国，达姆施塔特，艺术家园地
内的恩斯特·路德维希大公住
宅，1899—1901 年

图 8 约瑟夫·霍夫曼：布鲁塞尔，斯
托克莱特住宅，始建于 190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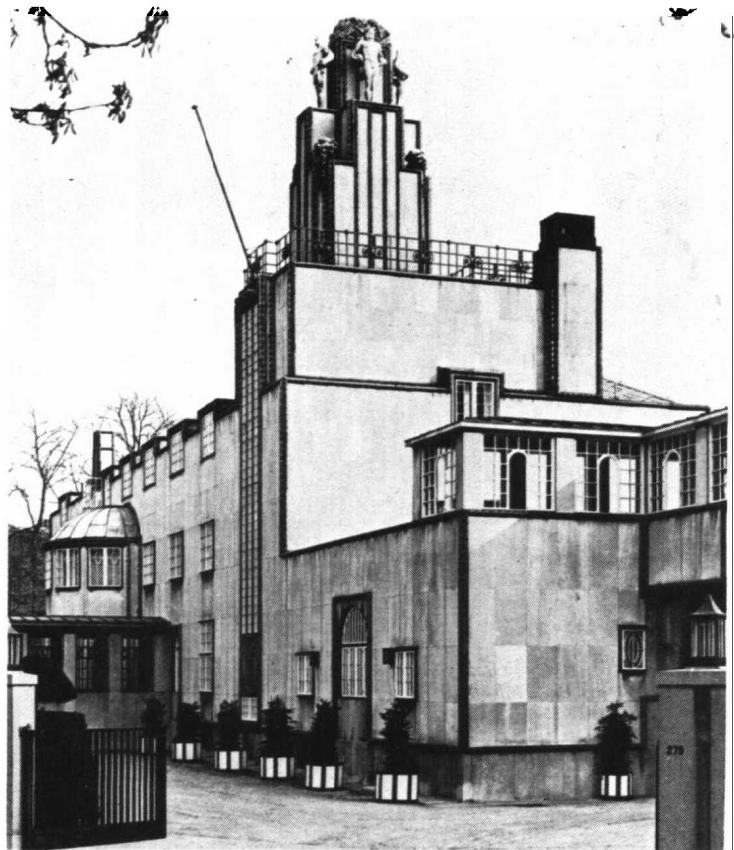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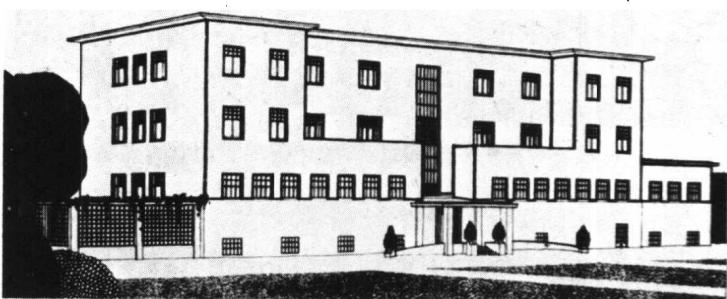
图 9 约瑟夫·霍夫曼：在布克尔斯多
夫为一疗养院所作的方案，
190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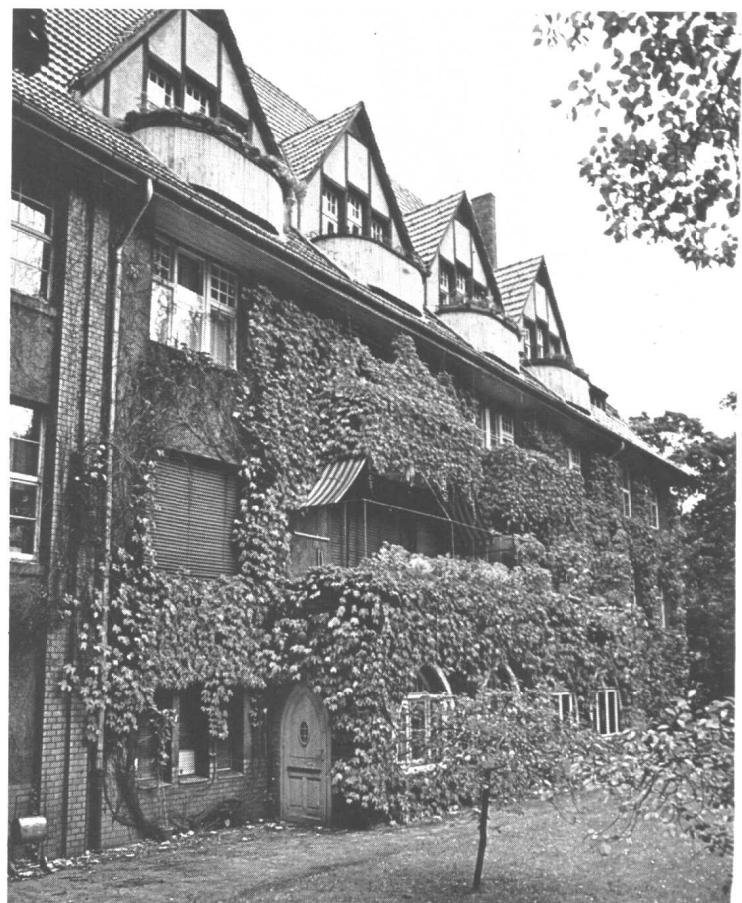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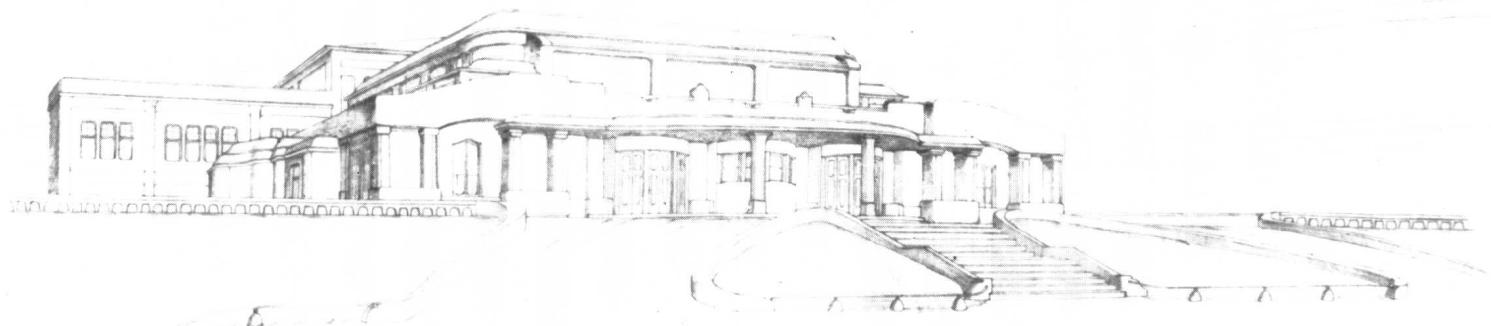
图 10 赫克托·吉马德：巴黎，贝伦格
府邸，1894—1898 年

图 11 亨利·凡·德·费尔德：在科隆
为工厂联盟展览会新作的剧
院透视图，1914 年

图 12 亨利·凡·德·费尔德：在德国
哈根的斯普林格曼别墅，1913
年

图 13 奥古斯特·恩代尔：柏林西端
公寓，191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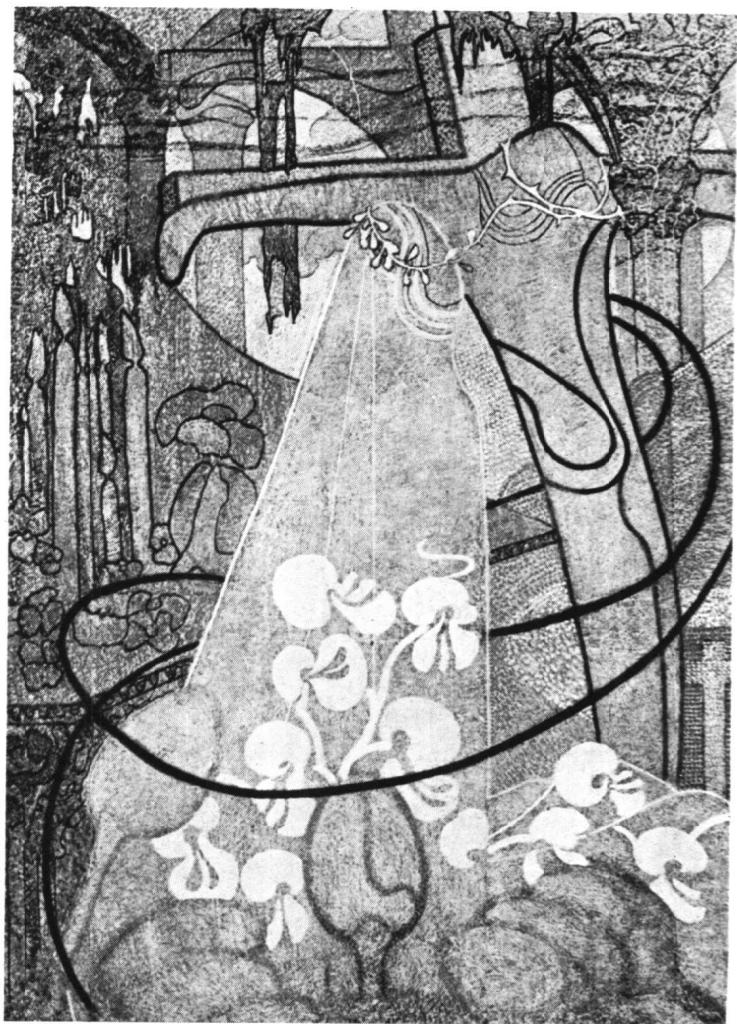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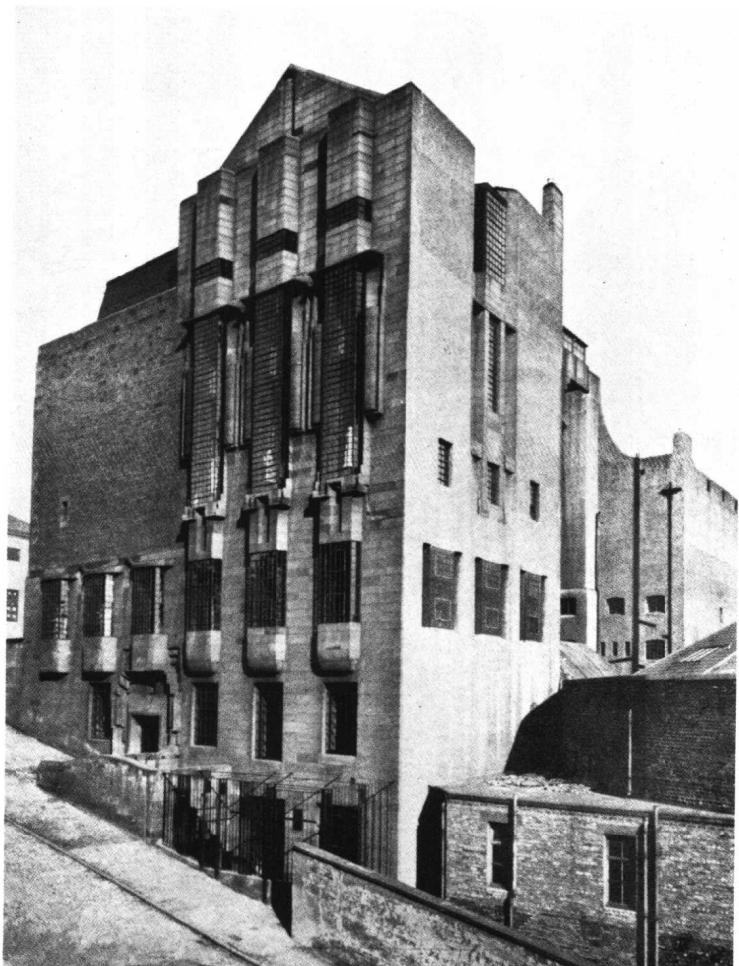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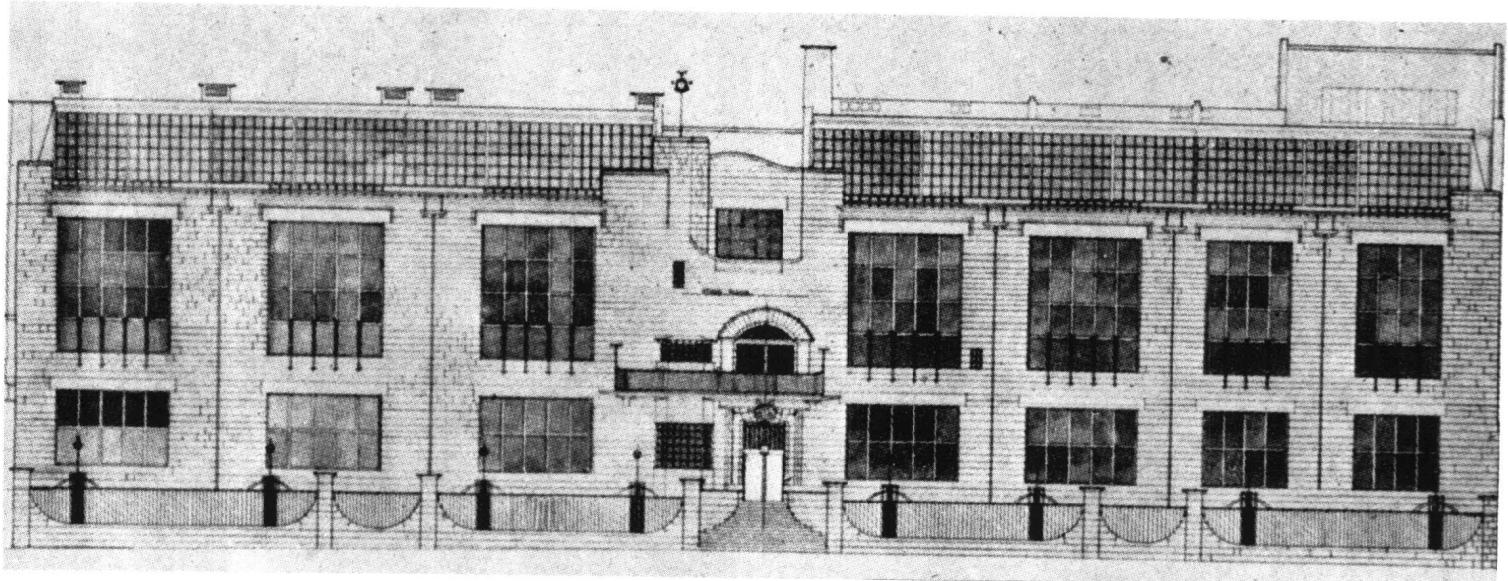


图 14 查尔斯·伦尼·麦金托什:英国,格拉斯哥,艺术学校的立面图,开始设计于 1896 年

图 15 查尔斯·伦尼·麦金托什:格拉斯哥,艺术学校,从西面看图书馆部分,1907—1909 年

图 16 约翰·索恩·普里克尔:《新娘》,1892—1893 年(荷兰,奥特洛,赖克斯博物馆藏)

(Alphonse Mucha)、杜夫兰 (Maurice Dufrene)、加利 (Emile Galle)、安德烈 (Emile Andre) 等人,他们都把创作看成是获得乐趣的机会,是表现自己思想解放的机会。霍夫曼的主要思想是提倡建筑要恢复到手工艺状态,他为维也纳工厂所设计的装修与产品就是明显的反映;其他如巴塞尔为杜克罗特公司设计的装修,麦金托什于 1896 年开始设计的格拉斯哥艺术学院和 1902 年在基尔马柯姆与海伦斯堡所设计的一些住宅,以及由博维、斯科特、加利和索纳特 (Gustave Serrurier-Bovy, Machie Hugh Bailie Scott, Emile Galle, and Michael Thonet) 等人所设计的作品都是如此。

但是在抵御“混凝土工程”和企图恢复建筑的工艺品质量,从而达到优美的造型时,这一切努力都已是最后的滩头阵地了。新艺术运动作为对浪漫主义的怀念曾喧闹一时,他们既想有大都市的场面,又要商业广告的刺激,其中包括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两方面的作品都有。例如瓦格纳在维也纳建造的住宅与邮政储蓄银行;赫特尔和维尔霍斯基 (Hurtre and Wielhorski) 设计的一些巴黎餐馆(包括在波卡多路的兰哈姆大厦内的餐厅);马尔纳兹 (Louis Marnez) 所设计的一些作

品,以及勒基纳 (Odon Lechner) 在匈牙利设计的一些公共建筑;吉马德设计的罗马杭伯特会堂 (Auditorium Humbert);在巴黎由切丹尼 (Georges Chedannt) 设计的拉菲亚特商厦等都是属于此类情况。他们渴望把私密空间的处理手法变为社会的需要,在大都市的不稳定性中升华为一种精神艺术,一种视觉的刺激艺术。这就是精神贵族玩弄的最后一张王牌。新艺术运动曾经在一些建筑中产生了影响,但是他们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大量的新资产阶级不赞成这种主张,而新兴的工业化方法才对他们有吸引力。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由奥尔布里奇、麦金托什、霍夫曼所创造的含有神奇色彩和颓废氛围的新艺术运动是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反抗的表现,他们不愿意看到金钱左右一切的现象在建筑艺术领域产生,他们企图用新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新的希望。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那些墨守陈规的新作品也同样是不受欢迎的。

新艺术运动一些代表人物过去所做的贡献无疑已成了世界建筑史上的里程碑,他们在建筑创作上的成就是值得庆贺的。我们追忆往事,目的是为了要促使我们在现有不成熟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在开始的这些章节中我们将要追溯一些在时间上比本书所限定的范围早得多的一些情况,当然这些情况是有争议的。大部分著作在说到现代城市规划诞生的时候,都会把注意力集中于19世纪早期的乌托邦思想及欧洲的一些首都城市,但这却造成了历史写作的局限性,从而使我们在试图分析历史的时候产生不正确的偏向。¹虽然欧、美二洲之间的交往曾一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没有人会否认美国的城市规划思想不如欧洲的清晰。然而正是在美国,由于进步力量的冲击,收入与利润之间特殊的内在关系,加上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相互对立,在19世纪后半叶共同形成了结构坚固的核心,并且创造出一种真实与恰当的传统。要把握这一传统,就要追溯这个与欧洲同时发生,并平行发展的过程的起源(关于欧洲的过程见本书另一章)。这也是为了检验关于那些至今依然有活力的实践与观念的新假说。

大约在1860年左右,大规模的经济发展与地区性的城市化在美国已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这种成长与新的都市秩序在铁路的特殊发展中找到了催化剂: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大约有40%—45%的美国私人资本来自于铁路的扩张。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具有爆炸性活力的发展体系。就像P·A·巴兰(P. A. Bzran)和P·M·斯威齐(P. M. Sweezy)曾经指出的,正是在那时,典型的垄断资本企业和巨大的股份有限公司呈现出它们特有的形式。这种现象决定了整个美国的体制,它的结构对相关的部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对城市增长和对城市边沿开发区的影响更为明显。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也加入了城市化的过程。由于工厂的发展所直接导致的公司城镇的到处分布,构成了美国资本主义最有活力的模式。公司城镇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城(Paterson)的一次尝试,他通过制造业应用协会代理机构予以实现,其城市规划是由P·C·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和N·哈伯德(N. Hubbard)在1791—1792年间设计的。然而,不超过30年,第一个城市社区就由于完全为了单纯工业的成长而出现了。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镇(Lowell),始建于1823年,它位于梅里马克(Merrimack)河岸上,创始人是梅里马克制造公司的首脑K·布特(Kirk Boott)。他受到一位开明的新英格兰企业家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的影响。洛厄尔在沃尔瑟姆(Waltham)的产业为公司的财富创下了基础。洛厄尔所实行的严格的阶级等级制度是他工厂生产组织方式的忠实反映。新城的城市化

概念完全反映了在工业领域中受雇佣的劳动力的组成,甚至连社区——到1845年,已有30000居民——的建筑布局也受其制约。洛厄尔的例子特别重要:这个聚居点的形式完全取决于生产组织的结构方式,而这种组织方式则是善良愿望与企业之间模糊结合的结果。这些企业在经济上还不具备将工业管理与城市管理综合起来解决房地产的能力。

19世纪40年代,兴起了像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和马萨诸塞州的霍利奥克这样一些以洛厄尔为原形的聚居点模式。然而,只有在铁路资本介入之后,工业投资与土地投机之间的融合才得以实现。土地投机这种可怕的体系是当代的一种发明。一方面,铁路工业的特征是生产性投资可以获得巨额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铁路所拥有的巨大经济实力使它可以对立法机构和政治机构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使之成为企业在经济上的保护人。大约1850年,美国建成了10000英里(16090km)左右的铁路系统,它既是工业发达地区迅猛发展的反映,而且也刺激了城市化和大都会集中现象的出现。然而在美国,集中与分散并不是可选择的:由于居住性郊区的兴起,使单一功能的第三产业城市得以发展,那些郊区住宅首先提供给有产阶级,其次是提供给中产阶级使用的,而贫民、移民和有色人种的贫民窟则拥挤地围绕着商业中心区。

很明显,这个过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它不仅仅直接影响到特定的地方,也影响了整个广大的地区。伴随着伊利诺伊州中心铁路线(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 line)的铺设进行了一场移民,其桥头堡为伊利诺伊州的开罗(Cairo, Illinois)。这个镇采用标准的方格道路网系统,并且由于威廉·斯特里克兰(William Strickland)在1838年到1840年间所作的成功设计而获得了某种建筑上的荣誉。正是在19世纪50年代,沿铁路线的土地投机的规模才逐渐扩大起来。为防止立法的限制和寻求用作铁路的开发保留土地,人们组织了一个有关财产投机的附属社团,伊利诺伊中心联合会(the Illinois Central Associates)。其结果是在铁路沿线各车站依样复制一个严谨的城市化方案,变成了在该区域范围内对那些地区所进行的庞大开发过程的第一个核心,并以这种方式保证了特殊的收益。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型。经过小小的调整后,它在整个美国范围内都被复制了,于是整个国家就有点好像成了东海岸城市和大湖地区工业集中城市在内陆的殖民地。铁路线上的公司城镇在彼此竞争中扩大开来,在这种竞争中,利益是唯一被关心的。另外还有一些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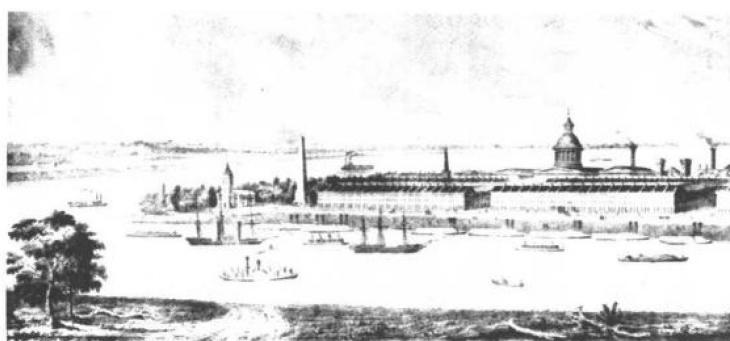


图 17 伊利诺伊州地图,表示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的铁路线及公司所拥有的财产,1860 年

图 18 威廉·斯特里克兰:伊利诺伊州,开罗的景观,1838 年

图 19 塔皮(A. Tapy):《铁马的嘶叫》,1859 年(纽约,加尔比施收藏)

图 20 描写 C·范德比尔特和 J·菲斯克之间为征服西部而进行的竞争的讽刺性漫画

图 21 弗雷德里克·罗·奥姆斯特德:华盛顿州,塔克马城的规划,187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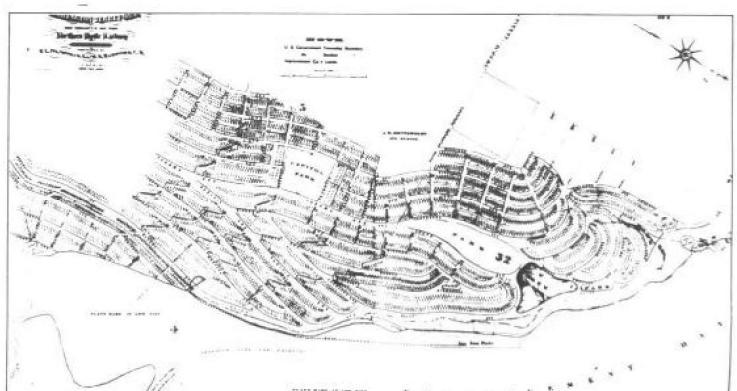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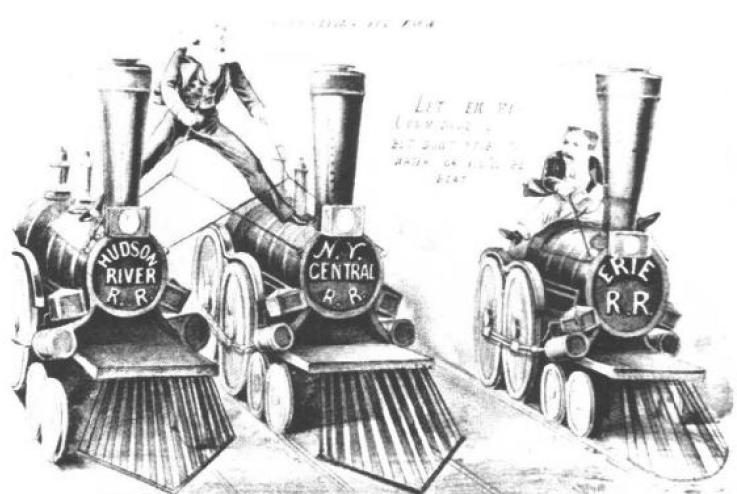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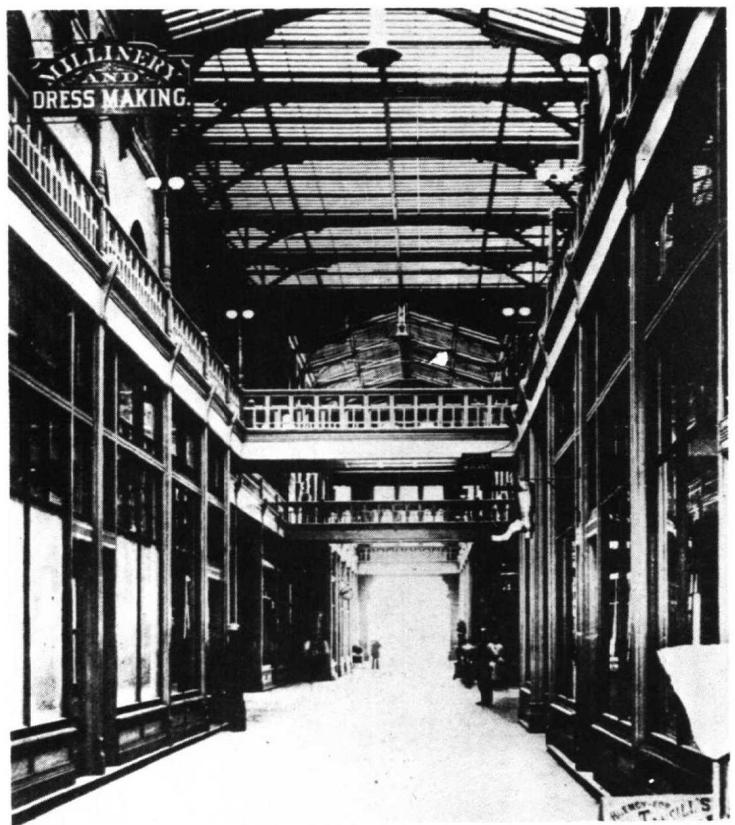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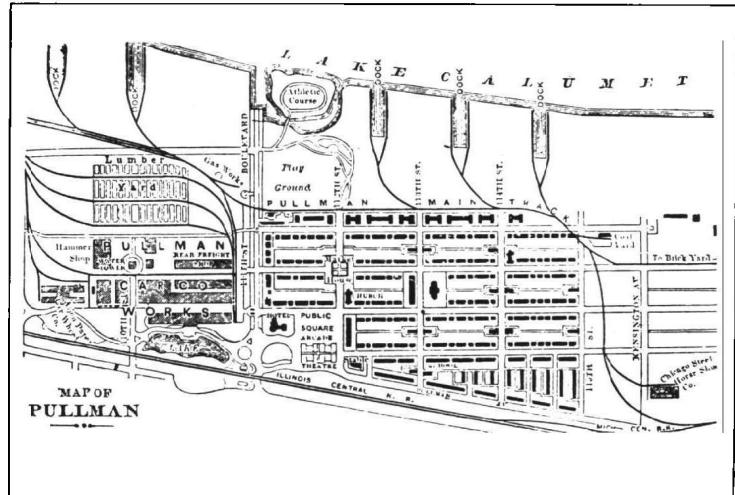


图 22 贝曼和巴雷特:伊利诺伊州,普尔曼镇的规划,1880 年

图 23 贝曼(建筑负责人):伊利诺伊州,普尔曼镇建筑内的拱廊,188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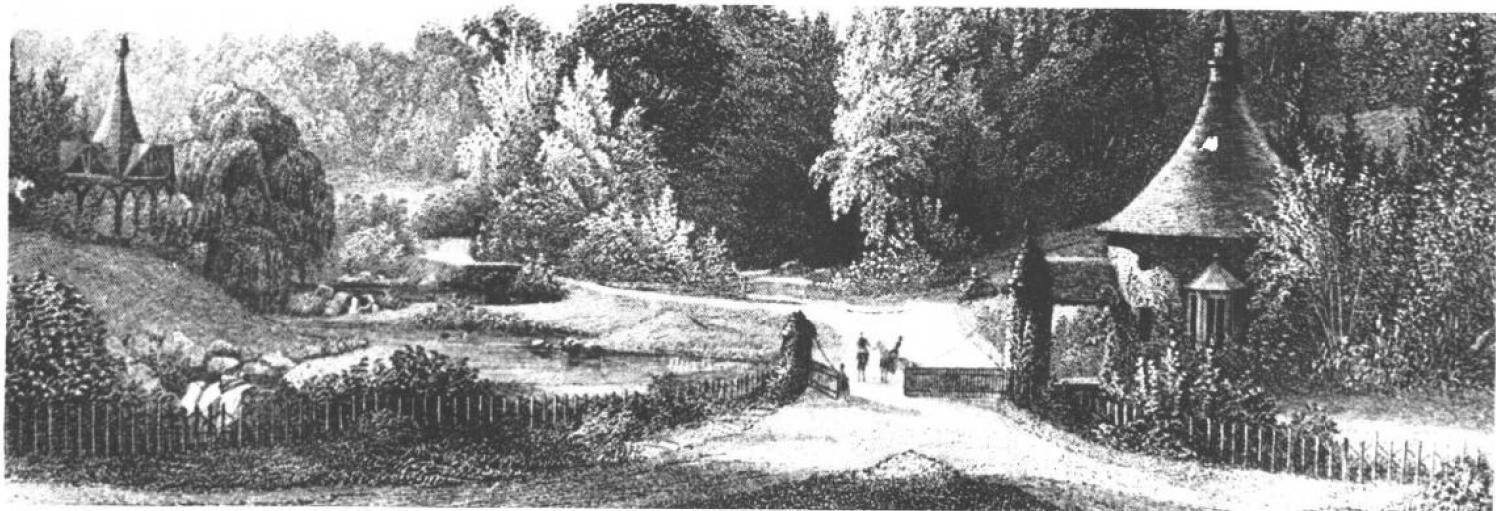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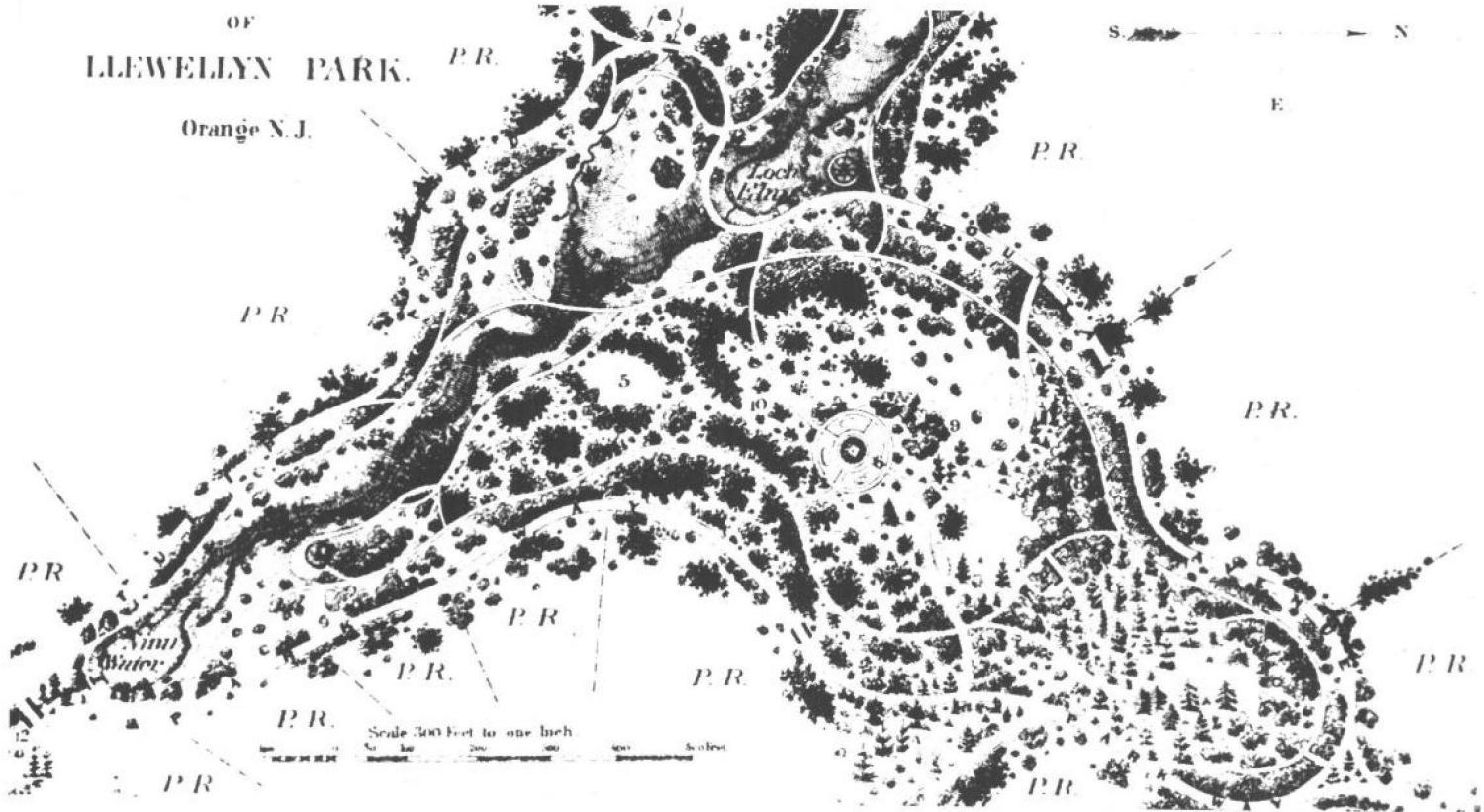
北太平洋铁路(Northern Pacific Railroad)造就的城市,比如,华盛顿州的托克马(Tacoma, Washington)。弗里德里克·罗·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为它作了规划,但没有实现。在堪萨斯州,落基山脉一带地区,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出现了新的社区。在征服西部的经济过程中,最初先辈们的观念被赋予了新的形式,其桥头堡是芝加哥。无论从确切的意义还是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讲,芝加哥都是东部海岸大都会与内地广大的物资供应地区之间的一个转换点。

在芝加哥近郊兴起的一座公司城镇,最好的体现了 19 世纪后半期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普尔曼镇(Pullman,现已合并入芝加哥),就是同时标志了自由经济发展的鼎盛与衰落的一次试验。贝曼(Solon S. Beman)和巴雷特(Nathan F. Barrett)在 1880 年接受铁路巨头普尔曼(George M. Pullman)的委托,为普尔曼镇作了规划。这个规划是美国折衷主义最好的实例之一,贝曼精心设计的浪漫主义建筑与巴雷特设想如画的城市景观完美地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普尔曼除了对规划的布局认为能提高生产率以外,他对建筑形式并不感兴趣。一方面,这个方案有助于将工人同附近动荡不安的大城市社会环境隔离开来,因为在 19 世纪 70 年代,这个城市被激烈的阶级斗争困扰着;而另一方面,它也确保了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对工人的严格控制,在政治上孤立工会的支持者,在经济上则制约工人的流动性和工资要求。从严格的城市化观点来看,普尔曼镇提供了与美国任何别的地方都不同的住房标准和服务,而当时的评论者也从中看到了企业利益与城市革新之间一种积极的结合。然而,尽管这种控制在 1893 年的经济危机中已受到了极大的动摇,但还是招致进步人士对那种政治与经济进行联合控制的方式提出批评。第二年席卷了整个芝加哥的暴力罢工,摧毁了这个体系的基本前提——将工人阶级同大城市,实际上是同整个国家隔离开来,同时试图严格控制劳动力市场。伴随着普尔曼镇的罢工,各种新的行业组织,以及在这个公司城镇中所作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尝试,都一起被卷进了一场标志着美国劳工运动史上重要阶段的决定性斗争,并且揭示了在劳工矛盾中国家所起的作用问题。就这样,一次城市设计的尝试引发了对整个体系基本原则的疑问。

同时,旨在确定解决城市问题的新的激进方法也在酝酿之中,这些方法都对竞争体系持批评态度:美国城市规划的起源与美国进步的政治传统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并非偶然。我们也不能低估这个事实,在文学上所谓的美国文艺复兴时代,比如爱默生(Emerson),梭罗(Thoreau),惠特曼(Whitman)以及梅尔维尔(Melville)等人的著作具

图 24 亚历山大·杰克逊·戴维斯:新泽西州, 奥兰治, 卢埃林公园规划, 1853 年

图 25 亚历山大·杰克逊·戴维斯:新泽西州, 奥兰治, 卢埃林公园入口, 1853 年





CENTRAL PARK.